

辛克莱·刘易斯 小说的叙事空间 研究

A Study of
Narrative Space
in Sinclair Lewis's
Fiction

张海榕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辛克莱·刘易斯 小说的叙事空间 研究

A Study of Narrative Space in Sinclair Lewis's Fiction

张海榕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汉、英 / 张海榕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

ISBN 978 - 7 - 5135 - 1707 - 2

I . ①辛… II . ①张… III . ①刘易斯, S. (1885~1951) — 小说研究 — 汉、英 IV .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4623号

出版人：蔡剑峰

责任编辑：程 序

封面设计：覃一彪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100089)

网 址：<http://www.fltrp.com>

印 刷：北京传奇佳彩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50×980 1/16

印 张：17.75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35 - 1707 - 2

定 价：66.90元

* * *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物料号：217070001

本文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资助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空间批评视域中的辛克莱·刘易斯小说叙事研究”资助。

序

张海榕的博士论文《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即将出版，作为她的导师我感到非常欣慰，嘱我作序，我很乐意，但也有些为难，其原因显而易见：为学生的书写序，唯恐有失公允。好在评审专家已审读其论文，并都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同时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赞同论文评阅专家的意见，已嘱咐海榕遵照修改完善。我为她的努力和务实感到高兴。从这些专家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张海榕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且具有学术探索精神的年轻学人。其论文是国内第一部运用叙事空间理论深入评析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博士论文，在经典重读方面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当然，海榕的论文远非完美无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为任何理论视角的借用都要面对是否合适的问题。有关叙事空间的理论在国内介绍偏多，而深入的研究相对较少，运用这一视角专门研究一个经典作家的论述更不多见。这意味着，在具体研究辛克莱·刘易斯时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少。可想而知，海榕在论文写作中一定遇到不少困难，但也表明了她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学术的执著。海榕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以不凡的毅力和精力克服困难，出色地完成 20 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一份辛劳，一份收获。其博士论文受到了评审专家的好评。

该论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为切入点，借鉴了包括叙事学在内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方法和视角，并在深入分析文本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刘易斯的主要小说《大街》、《巴比特》和《多兹华斯》中的叙事特征及其作为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性和文本

内涵。其次，该论文在借鉴列斐伏尔空间观的同时，还增加了文学特有的审美层面，即对刘易斯小说的文学空间进行界定、拓展和分类，并将刘易斯小说的文学空间类型化为“地理景观空间”（物质层面）、“个体心理空间”（精神层面）、“社会性别空间”（社会层面）。全文通过文本细读法，着重考察刘易斯多部小说叙事中的空间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与辩证关系。张海榕把刘易斯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在系统研究其共性的同时，还悉心辨析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颇具新意。依我看，归结起来，这篇博士论文（即本专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是“空间研究视角”。与国内外刘易斯研究相比，张海榕对刘易斯小说所做的叙事研究具有她采用了社会学的空间批评与文学中的叙事研究相结合的一种研究方法，即从叙事视角出发分别研究叙事与作家的文化情感、人物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的性别机制三个主题方面的关系，旨在探讨刘易斯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特征，并深入地揭示“空间”概念在刘易斯小说中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层的思想内涵。可喜的是，她2009年分别获得了江苏省人文社科项目“空间视域下的辛克莱·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这是张海榕在研究刘易斯小说方面所取得的突破，与她运用空间批评的方法是分不开的。

其二是“跨学科的”问题意识。在跨学科研究中，我们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主动地寻找问题，合理地选择问题，积极地求解问题，以实现跨学科研究的目标。跨学科研究有诸多优势，譬如能够超越单一的学科视角无法看清多面的缺陷。就叙事学研究而言，刘易斯小说叙事的诸多研究成果显示，无论是“讽刺手法”研究，还是“人物形象”剖析，或者是“修辞学”研究分析都属于从时间维度剖析刘易斯的叙事艺术，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维度上的叙事学研究。实际上，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中散布着丰富的地理景观内容，承载着作家对文化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性别空间的深入思

考以及对小说空间化叙事的艺术创新实践。张海榕将社会学中的空间批评研究与文学中的叙事学研究相结合，打破了刘易斯小说的传统叙事研究范式，既有助于挖掘刘易斯小说的文本内涵，也有助于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跨学科交融。在这个交融的过程中，社会学与文学得以共生，历史与现实得以互动，作家与人物得以结合。这种跨学科的分析和归纳、评析与总结，不仅把刘易斯小说的研究推向了深入，而且还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

其三是“强烈的”本土意识。张海榕的这篇博士论文从文学、社会学、新文化地理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对刘易斯小说的文学文化精神和社会性别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特别注重本土研究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期为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建构起到某种潜在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这篇博士论文观点突出，论证充分，资料详实，分析细腻，逻辑性强，特色鲜明。当然，作为第一次运用空间批评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刘易斯小说的博士论文，其中自然还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如刘易斯的小说选择方面，几乎集中讨论刘易斯20世纪20年代的重要作品，刘易斯的早期小说和后期作品几乎没有涉及，这些似乎还可以作更广、更深、更细的讨论。刘易斯整体研究仍存在大量的空间有待挖掘，如刘易斯的短篇小说研究、传记研究等等都是一块块“处女地”，尚待开发。不过这些都可以作为张海榕今后研究的课题和努力的方向。

张海榕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她在科研工作方面有了新的起点。我相信她会继续扎实努力，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中国辛克莱·刘易斯研究以及美国文学研究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杨金才

2011年10月20日于南京大学

前言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他用敏锐的眼光审视社会并以犀利的文笔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面貌。评论界普遍认为刘易斯的作品是一种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现实主义小说，然而他们却很少关注其作品在空间层面的文学价值和内涵。实际上，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中散布着丰富的地理景观内容、承载着作家对文化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性别空间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小说空间化叙事的艺术创新实践。

“空间”在刘易斯的小说叙事中具有多重的空间维度与深刻的思想内涵，不仅暗合了当前的空间理论与文化领域的“空间转向”思潮，又兼具独特的空间叙事指向。它一方面指向一条直观的地理线路，从美国乡村戈镇出发，途经中西部城市泽尼斯，最后抵达异域欧洲大都市，这条线路呈现出地理景观逐步走出美国本土，走向异国他乡的地域性态势。另一方面，它又指向一幅多通道的、抽象的空间图谱，不但包含客观存在的诸多社会现象，如美国城乡差异、国内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欧美文化的较量、男女性别机制的社会束缚，而且还包含主观上的人的复杂因素，如自我与本我、自我和他者、自我与社会等等多重心理冲突内容，上述这些具体空间与抽象空间中所发生的运动和变化冲击着、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空间的文化想象。刘易斯的小说文本正是作家对这一转变空间文化想象的再现体，他的小说既是人性与社会的探索基地，又是文化地理学与空间批评理论的多元共存领地。

空间批评理论的奠基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主要从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三个方面来思考空间的特性。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研究融叙事

学视角与空间问题研究于一体，一方面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研究刘易斯小说中的空间问题，对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进行了文学界定与分类，将其划分为“地理景观空间”（物质层面）、“个体心理空间”（心理层面）、“社会性别空间”（社会层面）三个维度，另一方面从叙事视角出发分别研究叙事与作家的文化情感、人物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的性别机制三个主题方面的关系，旨在探讨刘易斯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特征，步步深入地揭示“空间”概念在刘易斯小说中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深层的思想内涵。刘易斯的小说从地理景观、个体心理和社会性别三个主题范畴建构出独特的文学空间研究模式，为空间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深化并拓展了现有的空间理论内涵。

本书的主体共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三个章节和结论），采用以点带面、辐射整体的方法，将作品分析研究与作家思想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对作家与作品中的叙事艺术与空间问题的整体观照。本书选择刘易斯创作顶峰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三部代表作为主要论述文本：《大街》（1920）、《巴比特》（1922）和《多兹华斯》（1929）。从宏观层面上看，本论文旨在首先回答刘易斯“他写了什么空间”、“他如何写空间”，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他为什么要写空间”。从微观层面来看，本书既聚焦于刘易斯小说的地理景观视角，突出刘易斯小说的空间化叙事特点，同时又紧扣作品的深层结构、思想主题及作家艺术创作时的文化态势。

导论部分首先回顾和分析了西方和中国近百年来刘易斯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刘易斯从20世纪初登上文坛便成了西方批评界关注的中心，其美国研究史清晰地显现了刘易斯整体研究的发展趋向——从20年代的“传记研究”为主到三四十年代的“讽刺艺术”的形式研究，再到50年代的“社会批评”、六七十年代的“人物形象分析”和“语言修辞学研究”、80年代“文化研究”，直至新世纪以来“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新趋势。国内刘易斯的小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刘易斯研究有几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刘易斯小说的整体研究不平衡，即某部作品研究“扎堆”，而其他作品则基本无人问津；二是研究内容受制于上世纪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既没有理论支撑，又缺乏深度文本分析；三是

研究焦点明显滞后，研究视角过于老套，且对国外刘易斯研究现状和动态缺乏一定的了解。

第一章“地理景观空间”研究旨在阐明地理景观叙事与刘易斯复杂的文化情感结构之间的关联，其研究路径着眼于小说中类别化的物质空间。从主题上来说，刘易斯为了揭示美国现代地域空间的特征，巧妙地运用了乡村、城市和异域大都市的各种地理景观，使之成为揭示小说主题的空间素材。小说中无论是对“病毒化”的乡村叙事的讨论，还是对“标准化”的城市叙事的研究，或者是对“美国是世界的中心吗？”的异域叙事的质疑，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系统，从不同的地理角度折射出一个巨大的、基调统一的美国文化空间，成为表征刘易斯笔下地理景观文化性特征的重要手段。从叙事手法上来说，刘易斯通过时间的空间化、时间的凝固以及时间感的消失来重新组建小说中的时空秩序，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状况下人们生存的无奈和世界的无序。

第二章“个体心理空间”聚焦于剖析小说中个体心理空间叙事与人物主体自我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研究路径由“外部空间”向小说人物“内部空间”的转变。个体心理空间既是一种表征的空间，又是地理景观被赋予了个体特征的空间。小说中“回归的娜拉”、“寻找梦中的仙女”和“房车的启示”等隐喻不仅折射出一个自我怀疑、一个丧失稳定心理结构的主体试图逃离现实世界，但又逐步走向心理平稳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个体心理空间背后蕴含的美国时代精神的碰撞与兴替。在叙事过程中，刘易斯时而采用隐性叙事与显性叙事并置、时而采用显性空间与隐性空间并置、时而又将意识流与蒙太奇手法并置来探索个体复杂、微妙的心理空间，展现出小说文本中主体的自我建构，塑造出“新型”小说人物的性格。

第三章“社会性别空间”直接指向小说的性别空间叙事与刘易斯探索建构美国理想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揭示空间问题上升到“社会”层面的研究意义。刘易斯在小说文本中给人物活动的众多社会空间抹上某种理想的色彩，形成作品中社会空间的主题基调。他在描摹这基调统一的美国社会时主要借鉴了拼贴画、印象主义等绘画的艺术形式，视觉化地再现出了具有性别特征的地理景观。它们既表征为女性主体探索乡村生

活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隔，又呈现出男性主体遭遇城市社会中男性气质的危机，更彰显出美国企业主借助异域行旅生活，追问异域纨绔精神与美国企业精神的差异，探寻建构美国理想男性气质等主题。刘易斯对社会性别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个统一主题基调的众多空间集合。这个空间集合从人物同社会、文化、性别等多种关系角度立体地、动态地呈现出刘易斯试图建构理想美国社会的种种努力与诉求，形成“刚劲有力、栩栩如生”的小说表述机制。

“空间”为我们开辟了刘易斯小说研究的多通道路径，它既行走在刘易斯的小说文本世界和小说指涉外部物质世界之间，又行走在空间化的小说叙事与新型小说人物性格塑造之间，更行走在差别化、具体的地理景观类型与抽象化、多层面的空间理论之间。刘易斯小说中复杂多样的地理景观叙事、文化空间内涵、个体心理空间书写以及社会性别空间表征不仅集中体现了刘易斯的思维能力与思考深度，还承载着其对小说空间形式的创作实践，它们展现了空间多层面表征与小说叙事艺术的水乳交融，既为空间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也为文学文本研究开启了新思路。

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文本分析法：本研究将通过细腻而深刻的文本分析去发现刘易斯小说叙事潜藏的内涵，融新理论于小说文本之中，进而做出一种可靠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价值判断。2) 叙事学“空间维度”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借鉴“空间形式”等叙事学理论，剖析作家刘易斯如何在安排时间线索和外部矛盾之外，关注小说叙事的空间形式，彰显小说内在结构的空间表现力。3) 社会学“空间”研究的方法：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既从属于“空间”概念，又包含着从绝对空间向历史空间转化，再上升至抽象空间的一系列过程，因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研究刘易斯的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通道。

本书研究的重点是：以空间视角为切入点，从文化空间、个体心理空间、社会性别空间三个维度整体呈现和揭示刘易斯小说叙事的本质。本书研究的难点是：1) 如何在文学研究中合理和有效地借鉴和运用列斐伏尔以社会学为背景的社会空间批评理论。2) 本书涉及多学科交融，但

因国内外直接相关的研究极少，这就需要一批了解相关学科、理论功底扎实的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空间”既是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的场所，也是表现这种社会变迁的重要再现体，还是不可见的现代性产生作用的对象，更是近现代美国社会的可见的社会结果。刘易斯的小说中的地理景观不仅是一种空间再现体、对象与结果的综合体，还是导致近现代美国社会空间变革的重要生产性力量，更是内在决定着作家叙述、分析和想象新型现代空间的表述机制。刘易斯的小说文本正是作家对这一转变空间的文化想象的再现体。

本书的创新之处突出地表现在三点：理论上，本书将列斐伏尔的社会学空间理论拓展到了文学研究，并结合刘易斯小说叙事的特点，对刘易斯小说的叙事空间进行界定、拓展和分类，为本研究和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基础的理论框架。方法上，本书强调文本与文化语境的互文性阐释，通过“地理景观”在点、线、面上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文学、社会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在多维视野中对刘易斯小说的文学、政治与社会内涵进行较为系统的文化梳理和阐释。这将能突破国内某种传统的断代文学史研究模式，也能在新的历史与文化维度下对刘易斯其人其作以及上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文学做出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解读。此研究方法和分析方法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均具有开拓性意义。研究视角上，本书从叙事学、社会学、新文化地理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对刘易斯小说的文学文化精神、社会性别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意义，特别注重本土研究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期为中国社会现代价值观的建构起到某种潜在的推动作用。

目录

导论	1
第一章 地理景观叙事与作家的文化情感结构	54
第一节 “病毒化”乡村叙事与时间的空间化	58
第二节 “标准化”城市叙事与时间的凝固	77
第三节 异域大都市叙事与时间感的消失	95
第二章 个体心理空间叙事与人物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	114
第一节 空间位移与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115
第二节 空间并置与男性自我意识的形成	140
第三节 异域空间体验与主体的欲望书写	160
第三章 性别空间叙事与美国社会的性别问题	178
第一节 乡村空间的性别区隔和女性公共空间的拓展	180
第二节 城市空间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男性气质危机	197
第三节 “共谋性”美国理想男性气质的建构	216
结论	232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63

导论

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885-1951）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用敏锐的眼光审视社会并以犀利的文笔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面貌。刘易斯1885年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普通小镇苏克中心（Sauk Center）。1903年秋，刘易斯就读于耶鲁大学文学系，并于1908年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期间刘易斯开始试笔写作，以《耶鲁文学杂志》（*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编辑的身份发表多篇文章，关注社会民生。刘易斯一生著作等身，创作了22部长篇小说、诸多短篇小说以及多篇戏剧、诗歌、散文。他创作的这些小说几乎都是当年的畅销书。从体裁上来说，他的小说可以分为“传奇”小说、“教育成长”小说、“讽刺”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从背景上看，可以分为“乡村”小说、“城市”小说和“欧洲”小说。从创作时间上则可分为三个阶段：“学徒时期”（1908-1919），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些儿童诗歌、短篇故事以及早期的传奇小说与教育成长小说，如《我们的雷恩先生》（*Our Mr. Wrenn*, 1914）、《鹰的踪迹》（*The Trail of the Hawk*, 1915）、《幼稚的人》（*The Innocents*, 1917）等；“黄金时期”（1920-1929）是刘易斯创作的鼎盛阶段，他出版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现实主义小说和讽刺小说，如成名作《大街》（*Main Street*, 1920），随后发表的小说有《巴比特》（*Babbitt*, 1922）、《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1925）、《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 1927）、《多兹华斯》（*Dodsworth*, 1929）等；“衰退时期”（1930-1951）指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评论界认为刘易斯的获奖既是他的文学创作生涯的顶点，同时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他后期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有《安·维克尔斯》（*Ann Vickers*,

1933)、《这里不可能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 1935)、《卡斯·蒂姆伯莱恩》(Cass Timberlance, 1945)、《王孙梦》(Kingsblood Royal, 1947) 和《世界如此广阔》(World So Wide, 1951) 等。

对于刘易斯其人其作，评论界褒贬不一。在美国本土，集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于一身的康斯坦丝·鲁克 (Constanze Rouke) 在《美国幽默》(American Humor, 1931) 一书中肯定了刘易斯小说叙事艺术的独到之处，她认为“刘易斯在《大街》和《巴比特》中首创了美国民族性的原型，他凭借几分美国本土化的幽默、滑稽性的模仿、个性化的独白、辛辣的讽刺、朴素的暗喻、欲言又止的夸张等叙事艺术把美国社会生活写得栩栩如生，因此，刘易斯在美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跟笛福 (Defoe, 1660-1731) 在英国一样，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Rouke 283)。另一位文学批评家谢尔登·诺曼·格雷布斯坦 (Sheldon Grebstein) 在传记《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 1962) 中也肯定了刘易斯的小说叙事艺术，认为刘易斯是“美国的狄更斯”，无论是在小说的叙事风格、人物形象刻画、作品美学底蕴，还是作家职业操守、童年经历，抑或是价值取向与政治观等诸多方面，刘易斯都与狄更斯 (Dickens, 1812-1870) 颇为相似。在欧洲文学界，1930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授奖委员会秘书埃·阿·卡尔费尔德 (Erik Axel Karlfeldt) 高度颂扬了刘易斯的叙事艺术成就，“辛克莱·刘易斯因其创作新颖人物所表现出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的叙事艺术和运用智慧和幽默创作新型人物性格的才能而获得 1930 年诺贝尔文学奖”(Karl Anderson 45)。他总结道：“刘易斯不仅用他的坚实的手、而且还用他嘴边的微笑和他心中的青春活力来激励自己开垦文学的土地，他是一位耕犁的天才。在美国，他既开辟了新的耕地，又具有新型开拓者的风度，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拓荒者”(刘易斯，《巴比特》329)。

然而，作为“文学拓荒者”的刘易斯域外获奖在美国评论界引起的轰动却无法称之为“欢迎和赞赏”，而须更正为“谴责和攻击”。美国多数作家、评论家与社会名流认为刘易斯的获奖并非“众望所归”或“实至名归”，他们甚至谴责诺贝尔奖评委会的此举是“对美国及美国人的侮辱”。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声称，“刘易斯的获奖缘于他对美国生活辛辣的讽刺迎合了欧洲人厌恶美国人、不信任美国人以及

嫉妒美国人的心理态势”。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则认为此殊荣应归于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或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或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而不应是刘易斯。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亨利·凡·戴克（Rev. Henry Van Dyke）指出：刘易斯获奖的理由是“因为他的小说如《巴比特》和《埃尔默·甘特利》等满足了欧洲人侮辱美国的欲望”。甚至连美国第30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都断言：“欧洲人以为我们美国人的生活正如刘易斯小说中描写的一样，但是，他们错了，他的小说并不能真正代表我们美国人的生活”（Lingeman 353）。从上述话语中可以分析出，刘易斯遭受“谴责和攻击”的真正原因并非由于小说的艺术水准，而是因为他作品中所揭示的美国社会的丑陋面貌惹恼了部分美国人。

与柯立芝总统的观点完全相左，美国剧作家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认为刘易斯的获奖并非对美国的侮辱，他指出：“事实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美国找不出比刘易斯更能代表美国和美国文化的作家”（Sherwood 11）。美国评论界人士认为刘易斯不过是个写通俗性读物的作家。这对于刘易斯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他的反应还是相当冷静的，丝毫不感到惊诧。早在1920年《大街》出版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大街》在当时美国出版史上创下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另一方面，也招到了评论界的猛烈攻击。他所揭示的美国乡村劣根性有损于家乡的荣誉。因此，他遭到包括自己父亲在内的乡亲的反对。但他并不妥协，并保持自己一贯的我行我素作风。1926年刘易斯曾拒绝普利策文学奖的颁奖，并说明理由：“所有的奖项如同头衔一样是危险的，普利策文学奖尤其令人不快，它不能真正代表美国文学”（Lewis, *Go East* 3）。此举轰动了整个美国文艺界。1930年他虽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在领奖时发表了题为《美国对文学的恐惧》的长篇演讲，并指出：“在美国，我们——不仅是读者，而且甚至是作家都惯于赞同——我们绝大多数人至今仍旧害怕那些批评美国的声音出现，害怕有人指出我们的错误，更害怕国外学术机构评价我们的优秀文学”（刘易斯，《巴比特》332）。继而，刘易斯多次在公开场合阐明自己的写作态度以及对美国文化所赋予的情感：“我写《巴比特》并非出于恨，而是爱！我热爱美国，但我不喜欢

她！”（I love America, but I don't like it!）（引自 Miller, 34）。尽管刘易斯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曾多次公开声辩，但他始终认为人们低估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他暗暗发誓要写出更多的骇俗之作，这一点可以从他获诺贝尔奖之后笔耕不辍中得到佐证。

美国学术界虽然对刘易斯的作品与获奖持不同态度，但还是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1933年，史学家伯纳德·德·渥托（Bernard De Voto）宣称：“刘易斯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小说家”（Voto 398）。在随后的1936年，刘易斯被授予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于1938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Fellow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就文学成就而言，刘易斯是参与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佼佼者，正是他创建了自己独特的美国文学的想象世界和文学方式。尽管他继承和使用英国人的语言，也援用了英国人的文学传统，但他更多地将眼光投放在美国这一特定文化地域上，尽可能地融入美国特征，包括其自然地理景观。

刘易斯小说的研究现状及其小说的叙事学研究

一直以来，文学评论界通常将辛克莱·刘易斯置于现实主义和讽刺手法的视野中，但伴随着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方式的更迭，刘易斯小说研究领域可谓新思迭起，潮涨潮落，别具一格。作为小说家的辛克莱·刘易斯非常幸运，20世纪初登文学舞台就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目光。先有书评家亨利·布林斯利（Henry Brinsley）在文章《三位哈佛小说家以及其他作家》（“Three Harvard Novelists, and Others”）中点评刘易斯同年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我们的瑞恩先生》，称之为“一本令人着迷的小说，虽文学的重要性不强，但可读程度较高”（Fleming 1）。两年后，乔治·苏尔（JR. George H. Soule）的《一位有前途的小说家》（“A Novelist with a Future”）首次关注刘易斯的生平，尤其强调其在纽约的生活经历。后有评论家斯图尔特·谢尔曼（Stuart Sherman）的专著《辛克莱·刘易斯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Sinclair Lewis, 1922*）出版，谢尔曼在对刘易斯作品进行概览性评述的基础上凸显了刘易斯超越其他同时代作家的写作才能，并称其为“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和威廉·豪威尔斯的文学继承人”（Fleming 13）。